

教师人文读本

增订版

总主编 张民生 尹后庆 于漪

下册

执行主编 商友敬 吴国平

JIAOSHIREN WEN

DUBEN

上海辞书出版社

教师人文读本

增订版

总主编 张民生 尹后庆 于漪

下册

执行主编 商友敬 吴国平

JIAOSHIREN WEN

DUBE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师人文读本/张民生,尹后庆,于漪主编. —增订版.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3. 8(2014. 4 重印)

ISBN 978—7—5326—3919—9

I. ①教... II. ①张... ②尹... ③于... III. ①人文科学—师资培训—教学参
考资料 IV. ①C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09631 号

责任编辑 刘 琼

装帧设计 李洪忠 杨钟玮

教师人文读本(增订版)

(全二册)

张民生 尹后庆 于 漪 主编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 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苏州望电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39.75 字数 712 000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978—7—5326—3919—9/G·799

定价: 68.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 0512—66700301

下篇

第一单元

思想的诞生

思维的乐 趣

王小波

二十五年前，我到农村去插队时，带了几本书，其中一本是奥维德的《变形记》，我们队里的人把它翻了又翻，看了又看，以致它像一卷海带的样子。后来别队的人把它借走了，以后我又在几个不同的地方见到了它，它的样子越来越糟。我相信这本书最后是被人看没了的。现在我还忘不了那本书的惨状。插队的生活是艰苦的，吃不饱，水土不服，很多人得了病；但是最大的痛苦是没有书看，倘若可看的书很多的话，《变形记》也不会这样悲惨地消失了。除此之外，还得不到思想的乐趣。我相信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经历：傍晚时分，你坐在屋檐下，看着天慢慢地黑下去，心里寂寞而凄凉，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剥夺了。当时我是个年轻人，但我害怕这样生活下去，衰老下去。在我看来，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

我插队的地方有军代表管着我们，现在我认为，他们是一批单纯的好人；但我还认为，在我这一生里，再没有谁比他们使我更加痛苦过了。他们认为，所谓思想的乐趣，就是一天二十四小时都用革命思想来占领，早上早请示，晚上晚汇报，假如有闲暇，就去看看说他们自己“亚古都”的歌舞。我对那些歌舞本身并无意见，但是看过二十遍以后就厌倦了。假如我们看书被他们看到了，就是一场灾难，甚至“鲁迅著”的书也不成——小红书当然例外。顺便说一句，还真有人因为带了旧版的鲁迅著作给自己带来了麻烦。有一个知识可能将来还有用处，就是把有趣的书换上无趣的皮。我不认为自己能够在一些宗教仪式中得到思想的乐趣，所以一直郁郁寡欢。像这样的故事有些作者也写到过，比方说，茨威格写过一部以此为题材的小说《象棋》，可称是现代经典，但我不认为他把这种痛苦描写得十全十美了。这种痛苦的顶点不是被拘押在旅馆里没有书看、没有合格的谈话伙伴，而是被放在外面，

感到天地之间同样寂寞，面对和你一样痛苦的同伴。在我们之前，生活过无数的大智者，比方说，罗素、牛顿、莎士比亚，他们的思想和著述可以使我们免于这种痛苦，但我们和他们的思想、著述，已经被隔绝了。一个人倘若需要从思想中得到快乐，那么他的第一个欲望就是学习。我承认，我在抵御这种痛苦方面的确是不够坚强，但我绝不是最差的一个。举例言之，罗素先生在五岁时，感到寂寞而凄凉，就想道：假如我能活到七十岁，那么我这不幸的一生才度过了十四分之一！但是等他稍大一点，接触到智者的思想的火花，就改变了想法。假设他被派去插队，很可能就要自杀了。

谈到思想的乐趣，我就想到了我父亲的遭遇。我父亲是一位哲学教授，在五六十年代从事思维史的研究。在老年时，他告诉我自己一生的学术经历，就如一部恐怖电影。每当他企图立论时，总要在大一统的思想体系里找自己的位置，就如一只老母鸡要在一个大搬家的宅院里找地方孵蛋一样。结果他虽然热爱科学而且很努力，在一生中却没有得到思维的乐趣，只收获了无数的恐慌。他一生的探索，只剩下了一些断壁残垣，收到一本名为《逻辑探索》的书里，在他身后出版。众所周知，他那一辈的学人，一辈子能留下一本书就不错。这正是因为在那些年代，有人想把中国人的思想搞得彻底无味。我们这个国家里，只有很少的人觉得思想会有乐趣，却有很多人感受过思想带来的恐慌，所以现在还有很多人以为，思想的味道就该是这样的。

二

“文化革命”之后，我读到了徐迟先生写《哥德巴赫猜想》的报告文学，那篇文章写得很浪漫。一个人写自己不懂得的事就容易这样浪漫。我个人认为，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能够和同行交流，是一种起码的乐趣。陈景润先生一个人在小房子里证数学题时，很需要有些国外的数学期刊可看，还需要有机会和数学界的同仁谈谈。但他没有，所以他未必是幸福的，当然他比没定理可证的人要快活。把一个定理证了十几年，就算证出时有绝大的乐趣，也不能平衡。但是在寂寞里枯坐就更加难熬。假如插队时，我懂得数论，必然会有陈先生的举动，而且就是最后什么都证不出也不后悔；但那个故事肯定比徐先生作品里描写的悲惨。然而，某个人被剥夺了学习、交流、建树这三种快乐，仍然不能得到我最大的同情。这种同情我为那些被剥夺了“有趣”的人保留着。

“文化革命”以后，我还读到了阿城先生写知青下棋的小说，这篇小说写得也很浪漫。我这辈子下过的棋有五分之四是在插队时下的，同时我也从一个相当不错

的棋手变成了一个无可救药的庸手。现在把下棋和插队两个词拉到一起,就能引起我生理上的反感。因为没事干而下棋,性质和手淫差不多。我决不肯把这样无聊的事写进小说里。

假如一个人每天吃一样的饭,干一样的活,再加上把八个样板戏翻过来倒过去地看,看到听了上句知道下句的程度,就值得我最大的同情。我最赞成罗素先生的一句话:“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大多数的参差多态都是敏于思索的人创造出来的。当然,我知道有些人不赞成我们的意见。他们必然认为,单一机械,乃是幸福的本源。老子说,要让大家“虚其心而实其腹”,我听了就不是很喜欢;汉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我看来是个很卑鄙的行为。摩尔爵士设想了一个细节完备的乌托邦,但我像罗素先生一样,决不肯到其中去生活。在这个名单的末尾是一些善良的军代表,他们想把一切从我头脑中驱除出去,只剩一本二百七十页的小红书。在生活的其他方面,某种程度的单调、机械是必须忍受的,但是思想决不能包括在内。胡思乱想并不有趣,有趣是有道理而且新奇。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不幸就是有些人完全拒绝新奇。

我认为自己体验到最大快乐的时期是初进大学时,因为科学对我来说是新奇的,而且它总是逻辑完备,无懈可击,这是这个平凡的尘世上罕见的东西。与此同时,也得以了解先辈科学家的杰出智力。这就如和一位高明的棋手下棋,虽然自己总被击败,但也有机会领略妙招。在我的同学里,凡和我同等年龄、有同等经历的人,也和我有同样的体验。某些单调机械的行为,比如吃、排泄、性交,也能带来快感,但因为过于简单,不能和这样的快乐相比。艺术也能带来这样的快乐,但是必须产生于真正的大师,像牛顿、莱布尼兹、爱因斯坦那样级别的人物,时下中国的艺术家,尚没有一位达到这样的级别。恕我直言,能够带来思想快乐的东西,只能是人类智慧至高的产物。比这再低一档的东西,只会给人带来痛苦;而这种低档货,就是出于功利的种种想法。

三

有必要对人类思维的器官(头脑)进行“灌输”的想法,时下正方兴未艾。我认为脑子是感知至高幸福的器官,把功利的想法施加在它上面,是可疑之举。有一些人说它是进行竞争的工具,所以人就该在出世之前学会说话,在三岁之前背诵唐诗。假如这样来使用它,那么它还能获得什么幸福,实在堪虞。知识虽然可以带来幸福,但假如把它压缩成药丸子灌下去,就丧失了乐趣。当然,如果有人乐意这样来对待自己的孩子,那不是我能管的事,我只是对孩子表示同情而已。还有人认

为,头脑是表示自己是个好人的工具,为此必须学会背诵一批格言、教条——事实上,这是希望使自己看上去比实际上要好,十足虚伪。这使我感到了某种程度的痛苦,但还不是不能忍受的。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总有人想要用种种理由消灭幸福所需要的参差多态。这些人想要这样做,最重要的理由是道德;说得更确切些,是出于功利方面的考虑。因此他们就把思想分门别类,分出好的和坏的,但所用的标准很是可疑。他们认为,假如人们脑子里灌满了好的东西,天下就会太平。因此他们准备用当年军代表对待我们的态度,来对待年轻人。假如说,思想是人类生活的主要方面,那么,出于功利的动机去改变人的思想,正如为了某个人的幸福把他杀掉一样,言之不能成理。

有些人认为,人应该充满境界高尚的思想,去掉格调低下的思想。这种说法听上去美妙,却使我感到莫大的恐慌。因为高尚的思想和低下的思想的总和就是我自己;倘若去掉一部分,我是谁就成了问题。假设有某君思想高尚,我是十分敬佩的;可是如果你因此想把我的脑子挖出来扔掉,换上他的,我绝不肯,除非你能够证明我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人既然活着,就有权保证他思想的连续性,到死方休。更何况那些高尚和低下完全是以他们自己的立场来度量的,假如我全盘接受,无异于请那些善良的思想母鸡到我脑子里下蛋,而我总不肯相信,自己的脖子上方,原来是长了一座鸡窝。想当年,我在军代表眼里,也是很低下的人,他们要把自己的思想方法、生活方式强加给我们,也是一种脑移植。菲尔丁曾说,既善良又伟大的人很少,甚至是绝无仅有的,所以这种脑移植带给我的不光是善良,还有愚蠢。在此我要很不情愿地用一句功利的说法:在现实世界上,蠢人办不成什么事情。我自己当然希望变得更善良,但这种善良应该是我变得更聪明造成的,而不是相反。更何况赫拉克利特早就说过,善与恶为一,正如上坡和下坡是同一条路。不知道何为恶,焉知何为善?所以他们要求的,不过是人云亦云罢了。

假设我相信上帝(其实我是不信的),并且正在为善恶不分而苦恼,我就会请求上帝让我聪明到足以明辨是非的程度,而绝不会请他让我愚蠢到让人家给我灌输善恶标准的程度。假若上帝要我负起灌输的任务,我就要请求他让我在此项任务和下地狱中做一选择,并且我坚定不移的决心是:选择后者。

四

假如要我举出一生最善良的时刻,那我就举出刚当知青时,当时我一心想要解放全人类,丝毫也没有想到自己。同时我也要承认,当时我愚蠢得很,所以不仅没干成什么事情,反而染上了一身病,丢盔卸甲地逃回城里。现在我认为,愚蠢是

一种极大的痛苦；降低人类的智能，乃是一种最大的罪孽。所以，以愚蠢教人，那是善良的人所能犯下的最严重的罪孽。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决不可对善人放松警惕。假设我被大奸大恶之徒所骗，心理还能平衡；而被善良的低智人所骗，我就不能原谅自己。

假如让我举出自己最不善良的时刻，那就是现在了。可能是因为受了一些教育，也可能是因为已经成年，反正你要让我去解放什么人的话，我肯定要先问问，这些人是谁，为什么需要帮助；其次要问问，帮助他们是不是我能力所及；最后我还要想想，自己直奔云南去挖坑，是否于事有补。这样想来想去，我肯定不愿去插队。领导硬要我去，我还得去，但是这以后挖坏了青山、造成了水土流失等等，就罪不在我。一般人认为，善良而低智的人是无辜的。假如这种低智是先天造成的，我同意。但是人可以发展自己的智力，所以后天的低智算不了无辜——再说，没有比装傻更便当的了。当然，这结论绝不是说当年那些军代表是些装傻的奸邪之辈——我至今相信他们是好人。我的结论是：假设善恶是可以判断的，那么明辨是非的前提就是发展智力，增广知识。然而，你劝一位自以为已经明辨是非的人发展智力，增广见识，他总会觉得你让他舍近求远，不仅不肯，还会心生怨恨。我不愿为这样的小事去得罪人。

我现在当然有自己的善恶标准，而且我现在并不比别人表现得坏。我认为低智、偏执、思想贫乏是最大的邪恶。按这个标准，别人说我最善良，就是我最邪恶时；别人说我最邪恶，就是我最善良时。当然我不想把这个标准推荐给别人，但我认为，聪明、达观、多知的人，比之别样的人更堪信任。基于这种信念，我认为我们国家在“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就丧失了很多机会。

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民族总是有很多的理由封锁知识、钳制思想、灌输善良，因此有很多才智之士在其一生中丧失了学习、交流、建树的机会，没有得到思想的乐趣就死掉了。想到我父亲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就心中黯然；想到此类人士的总和有多，我就趋向于悲观。此种悲剧的起因，当然是现实世界里存在的种种问题。伟大的人物总认为，假设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像他期望的那样善良——更确切地说，都像他期望的那样思想，“思无邪”，或者“狠斗私字一闪念”，世界就可以得救。提出这些说法的人本身就是无邪或者无私的，他们当然不知邪和私是什么，故此这些要求就是：我没有的东西，你也不要。无数人的才智就此被扼杀了。考虑到那才智之士的总和是一种难以想象的庞大资源，这种想法就是打算把整个大海装入一个瓶子之中。我所看到的事实是，这种想法一直在实行中，也就是说，对于现实世界的问题，从愚蠢的方面找办法。据此我认为，我们国家自汉代以后，动辄在进行

思想上的大屠杀；而我能够这样想，只说明我是幸存者之一。除了对此表示悲伤之外，我想不到别的了。

五

我虽然已活到了不惑之年，但还常常为一件事感到疑惑：为什么有很多人总是这样的仇恨新奇，仇恨有趣。古人曾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但我有相反的想法。假设历史上曾有一位大智者，一下发现了一切新奇、一切有趣，发现了终极真理，根绝了一切发现的可能性，我就情愿到该智者以前的年代去生活。这是因为，假如这种终极真理已经被发现，人类所能做的事就只剩下了依据这种真理来做价值判断。从汉代以后到近代，中国人就是这么生活的。我对这样的生活一点都不喜欢。

我认为，在人类的一切智能活动里，没有比做价值判断更简单的事了。假如你是只公兔子，就有做出价值判断的能力——大灰狼坏，母兔子好；然而兔子就不知道九九表。此种事实说明，一些缺乏其他能力的人，为什么特别热爱价值的领域。倘若对自己做价值判断，还要付出一些代价；对别人做价值判断，那就太简单、太舒服了。讲出这样粗暴的话来，我的确感到羞愧，但我并不感到抱歉。因为这种人士带给我们的痛苦实在太多了。

在一切价值判断之中，最坏的一种是：想得太多、太深奥，超过了某些人的理解程度是一种罪恶。我们在体验思想的快乐时，并没有伤害到任何人；不幸的是，总有人觉得自己受了伤害。诚然，这种快乐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体验到的，但我们不该对此负责任。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取消这种快乐，除非把卑鄙的嫉妒计算在内——这世界上有人喜欢丰富，有人喜欢单纯；我未见过喜欢丰富的人妒恨、伤害喜欢单纯的人，我见到的情形总是相反。假如我对科学和艺术稍有所知的话，它们是源于思想乐趣的浩浩江河，虽然惠及一切人，但这江河决不是如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为他们而流，正如以思想为乐趣的人不是为他们而生一样。

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人当然有不思索、把自己变得愚笨的自由；对于这一点，我是一点意见都没有的。问题在于思索和把自己变聪明的自由到底该不该有。喜欢前一种自由的人认为，过于复杂的思想会使人头脑昏乱。这听上去似乎有些道理。假如你把深山里一位质朴的农民请到城市的化工厂里，他也会因复杂的管道感到头晕，然而这不能成为取消化学工业的理由。所以，质朴的人们假如能把自己理解不了的事情看作是与己无关的事，那就好了。

假如现在我周围的世界又充满了“文革”时的军代表和道德教师，只能使我惊，不能使我惧。因为我已经活到了四十二岁。我在大学里遇到了把知识当作幸福来传播的数学教师，他使学习数学变成了一种乐趣。我遇到了启迪我智慧的人。我有幸读到了我想看的书——这个书单很是庞杂，从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一直到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地下小说。这最后一批书实在是很不堪的，但我总算是把不堪的东西也看到了。当然，我最感谢的是那些写了好书的人，比方说，萧伯纳、马克·吐温、卡尔维诺、杜拉斯等等。但对那些写了坏书的人也不怨恨。我自己也写了几本书，虽然还没来得及与大陆读者见面，但总算获得了一点创作的快乐。这些微不足道的幸福就能使我感到在一生中稍有所得，比我父亲幸福，比那些将在思想真空中煎熬一世的年轻人幸福。作为一个有过幸福和痛苦两种经历的人，我期望下一代人能在思想方面有些空间来感到幸福，而且这种空间比给我的大得多。而这些呼吁当然是对那些立志要当军代表和道德教师的人而发的。

【读后】

苹果公司的创始人乔布斯在得知自己身患绝症之后，曾说过一句名言：“死亡是生命最好的发明。”生命的乐趣也许正在于它的时间是有限的，长不过百年，对每个人完全公平。在这百年中却给不同的个体提供了不尽相同的生命舞台，其中的差异就在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思想不同生命品质便不同，生命品质不同则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就变化万千——或绚丽多彩，或苟且猥琐。毫无疑问，思想是人类在这个地球上所有生命当中特有的财富，可惜的是这样一个明显的道理并不是每个人都清楚明白。所以，臧克家才会说，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却死了。对于智能生命而言，死与活的标志不只是心脏的律动、气息的喘动，而是思想。正是思想的存在，思维的运动，才使生命绽放出动人的色彩。人要使自己免于生存期的彷徨和苦痛，便只有学会思维，向我们之前无数的大智者学习，摆脱个人思维的偏执与狭隘、专断与陋习。

需要引起警惕的是，在人类的历史中，总有一些人为了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试图钳制别人的思维。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不管你披着什么花哨的外衣，那些荒诞的企图终将以失败告终。而对于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要学会争取个人独立思考的权利。《独立宣言》的起草者之一帕特里克·亨利曾经说过，不自由，毋宁死。这里的自由，首先是思想的自由，所以“五四”先贤胡适才会向大众发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争谏。对于立志要成为道德教师的人来说，这样的自由尤为重要。

爱国的坐标

资中筠

资中筠(1930—)，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美国研究》杂志主编，是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资深学者、翻译家，精通英语及法语。生于上海，祖籍湖南耒阳。1947年毕业于天津耀华中学，考入燕京大学，1948年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51年毕业。著有《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财富的归宿》、《资中筠集》、《资中筠自选集》等。译著有法国巴尔扎克的《公务员》、《浪荡王孙》、《农民》，美国薇拉·凯瑟的《啊，拓荒者》，英国阿兰·德波顿的《哲学的慰藉》等。她追寻真理的勇气和澄明的思辨，激励着当代知识分子的坚持和前进。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不提倡爱国，但是恐怕没有哪一个国家像近代中国那样以之为最高道德标准，尤其对知识分子说来“民族大义”高过一切。中国古代主要是“天下”的概念，“国家”的含义随时代而异，“爱国”和“忠君”紧密相连。应该说现代民族国家意识是鸦片战争之后被列强的炮舰激发出来的，所以爱国也有了新的内涵，那就是面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何以自处，何以自救。在这一时代命题的召唤下，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的半个世纪中涌现出了一大批从事各种革新探索的思想家，学术讨论终于跳出了“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圈子，也可以说是自春秋战国以来第一次出现了接近于百家争鸣的局面。对于这一批人物，站在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在中国人又经历了一次灾难性的闭关锁国之痛，再次带着复杂的心情面对世界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标准来衡量谁个进步，谁个反动，谁个爱国，谁个卖国，也就是把坐标放在哪里给他们定位？如果说“以史为鉴，可知兴替”，那么这就不仅仅是一个历史观的问题了。相当一个时期以来，这个问题一直沉浮于我脑海中，近读

《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袁伟时著)一书颇受启发,史学非我专,不敢妄写书评,只是借此抒发一些久积于胸之见。

抵抗侵略、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尊严,这是每一个爱国者的本能。但是当时严酷的现实是败局已定,中国已无可否认地落后了,惟有反躬自省奋发图强才能自救,而图强之道又恰恰需要向给自己造成了这么多痛苦的西方列强学习。19世纪下半叶的有识之士都在不同程度上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之间的区别以及他们的不同遭遇正在于这“不同程度”:中国究竟落后在哪里;在当时力量悬殊的形势下如何与西方国家打交道对自己最有利;如何全面、客观地认识西方国家;学什么、改什么才能彻底改变中国的落后状况,推动历史前进,这是衡量每个人的言行主张的坐标。一系列的人物:魏源、林则徐、郭嵩焘、徐继畲、王韬、郑观应、洪秀全、洪仁玕、曾国藩、李鸿章等等都要以这个坐标重新定位。

《晚清》一书从林则徐与郭嵩焘的荣辱对比开端,层层深入。林则徐是伟大爱国者,也是第一批放眼世界的先驱之一,史有定论。他除一度遭贬抑外,生前身后备受尊荣。但是比他晚20年走上历史舞台的同样也是坚决主张禁烟并积极参加两次反侵略战争的郭嵩焘,命运却大不相同。他生前遭到朝野的非议,戴着“媚外投降”的恶名郁郁以终,直到今天的某些历史著作中对他仍有贬词。二人差别究竟何在?事实上,正是由于郭嵩焘晚了20年,对中国的根本弱点认识更加深刻,主张向西方学习方面更为彻底,走得更远。作为第一任驻英国公使,他有机会亲眼考察西方国家,最终痛苦地得出了中国不但在物质上而且在政治制度、文化教养上全面落后的结论。他彻底改变了几千年的夷夏观念,甚至说西方“视中国亦犹三代之视夷狄也”。这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怎么能被接受?他还认定英国之强,在于其立国之本是议会民主制加民选市长制,这是它的“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二者相辅相成以成其富强,而造船、制器等等又是“其末中之一节”。凡此种种不但主政者听不进,也远超过传统士大夫所能接受的理念。所以他报送朝廷如实记录他所见所闻的出使日记,不但没有起到应有的振聋发聩的作用,反而在大臣中痛遭诋毁,竟至政府下令毁版,也就不足为奇了。

实际上在郭嵩焘之前与林则徐同代的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已经批判了华夏中心论,已经认识到朝政的腐败不在于明主还是昏君而是制度问题,并对西方民主有了模糊的向往,不过当时他的言论没有引起太大的注意,也就免去了因此获罪。与郭嵩焘差不多同时的王韬、郑观应、冯桂芬、薛福成以及第一个留美归国的容闳,都以不同的方式表达过相同的思想。他们在向西方学习问题上的主张归纳起来就是说:西方的长处并不止于物质文明,同时也在政治制度和精神文明,中国要改革应

学其根本,包括改革政治制度。不过他们本身是传统的士大夫,而且为了能为当世所接受,都煞费苦心尽量从传统文化中找依据。王韬提出了东西方“圣人之道”相通的理论,而且说“泰西诸国今日所挟以凌侮我中国者,皆后世圣人有作所取以混同万国之法物也”,受欺凌之后能够看出对方所恃之强正是实现人类共同进步的条件,这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是何等的眼光和识见!当然他不可能像与差不多同时代生于欧洲的马克思那样提出人类发展普遍规律的理论。

另一个不断遇到的问题是主战与主和之争。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郭嵩焘、王韬、徐继畲等人都是基本上主张对列强以和为主的方针,避免主动挑衅。其所根据的第一个前提是敌强我弱的态势,要奋发图强也需要时间,这是和的必要性;第二个前提是对西方国家对华政策目标的估计,他们的基本看法是认为西方国家确有“囊括四海”的野心,但是其手段是通过贸易,对中国的基本要求在于通商求利,而不是灭亡和占领。从这一估计出发,中国“迎其机而导之,即祸有所止,而所得之奇巧转而为我用”,这是和的可能性。再进一步是与外国交往中占不占理的问题。侵略与被侵略者之间有没有理可讲?郭氏仔细研究酿成“夷祸”,一辱再辱的惨痛经验教训,发现清政府处理失当,站不住理之处甚多:“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撓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蠢。真乃无可如何。”这几句话掷地有声,生动地概括了清王朝外交的昏庸和进退失据,《晚清》用了“泣血自省”字样,确实道出了郭氏深切痛苦的心情。

这里涉及一个具体问题:对于已经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该不该遵守?中国过去盛时所提倡的示天下以“信”的立国之道是否还适用?揣情度理,既然不平等条约是战败后被迫签订的,那么这一条约也就是当时力量对比的纪录。更何况它所反映的不仅仅是战场上的军事强弱之势,而是全面的、深刻的差距,改变之道在于先自图强。同时,即使是不平等条约,也是国家信誉所系,今天签字明天推翻,既足以招祸又必然进一步失去尊严。例如僧格林沁诱击根据《天津条约》而来的英国船之役,一时“天下称快”,结果招致1860年第二次英法联军之役,造成更加惨重的破坏,最后续订更加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对于僧氏之举,从郭嵩焘到曾国藩都曾强烈反对,曾国藩甚至认为他闯下这么大祸“义当杀身以谢天下”。但是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后世,僧格林沁气忿地打了洋人都被认为是爱国义举,虽败犹荣,而郭、曾的见解则有提倡媚外降敌之嫌。问题在于审时度势,靠这种突然袭击,甚至辱其使臣的做法能否扭转局势推翻刚刚签订的条约?谁的主张更能保护人民的利益,避

免更大的损失？如果不从意气出发而以理智的负责的态度考虑，答案应该是清楚的。

由此派生出的问题是：群众性的排外行动与同仇敌忾的民族正气如何区分？英明的统治者应善于区分不同情况，正确引导。用今天的话来说是“进行政策教育”。再进一步则是把“民气”引导到励志革新图强以取得真正与外国平等的资格，如以明治维新为开端的日本就是这样做的。但是昏聩而怯懦的清政府是完成不了这一任务的。它的做法正好相反：自己无力保护国家人民的权益，也不敢真正发动和依靠群众抗击侵略，却幻想个别、零星、自发的反抗，甚至是乌合之众的盲目行动可以推翻自己订的城下之盟，始而鼓励群众以卵击石作无谓的牺牲，失败招祸之后又屈从于外国的压力翻手加以镇压。慈禧对待义和团当然是众所周知的典型例子。《晚清》一书所举道光三十年（1850年）福州神光寺事件，虽是小事一桩，却也颇说明问题：两名并未见劣迹的普通英国人在福州城里租屋半年，却引起轩然大波，以告老在家的林则徐为首的一派主张立即强行驱逐其出城，并且摆出不惜为此一战的姿态；闽浙总督刘韵珂和福建巡抚徐继畲则出于“不敢启衅边隅”的考虑，主张采取缓和手段挤得他们最多住到租约期满就离去。就是这一缓急的分歧在当时却惊动了朝廷，徐氏等人被皇帝斥为“抑民奉夷”，屡次降旨追查。半年后两个英国人被迫离去，实际上是按照刘、徐的方针平息的风波，但二人旋即被免官。今天看来如此小题大做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在徐、林之间，显然徐的主张较稳妥而负责任。当时皇帝不察，处理不公，这在君主专制制度下也不足为奇。问题是至今在有些历史著作中对这一事件仍以强硬主张为是，以徐继畲为对外妥协投降。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是长期以来我国无论是在写历史中或是在现实的宣传中有一种塑造完美无缺的英雄形象的习惯，进而在意见上也变成绝对正确，这种不客观的态度比比皆是，岂独对林则徐一人以为然！其实林则徐在这一件小事上意见不当决无损于他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形象，而在思想上，到19世纪中下叶，不少人物已经比他更为前进，更加开阔，这也是事实。不过徐继畲等蒙冤更本质的原因还在于在是非判断中一个最经常起作用的因素，那就是把排外与爱国混为一谈。因此自鸦片战争之后几乎所有中国人驱赶和打击洋人的举动不论情节如何都受到讴歌，包括上述僧格林沁大沽口之役。

当然，进、退、和、战都只能审时度势个案对待，不可一概而论。暂时忍让与一味退让以求苟安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有一套利用争取来的和平环境励精图治的方略以及付诸实施的决心。这也正是这一批改革者与腐败的清廷的根本区别，自不能以“主战”还是“主和”划线。

同样，撇开传统的定论，从思想史的角度，以是否给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思想发展提供新的内容为尺度评论洪秀全与曾国藩的思想和言行，就很难得出曾国藩一定反动、洪秀全一定进步的结论。洪氏所设计的和部分实施的“天国”蓝图在政治上是中央集权而等级森严的专制王朝，在经济上是小农经济和企图消灭私产的空想平均主义，高度集中，一切官办，适足以限制生产力发展，却不足以限制特权的膨胀。他以基督教为旗帜，吸收的并非它的现代精神而是中世纪的神权统治，实质上也就是篝火狐鸣的翻版。按照洪秀全的理想如果成功地取代了清王朝，不可能推动中国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他的思想实际上落后于前面提到的一批知识分子。太平天国有一个洪仁玕提出了代表当时先进思想的建国方案《资政新篇》，但是他到南京时已是“天京事变”之后，这个政权已经腐朽，洪秀全虽然在短期内曾让他总理朝政，却不可能也无力采纳他的改革方案。所以洪仁玕的思想不能代表太平天国的主流。

从这里联想到对中国历史上农民运动的看法。如果从是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有助于还是有碍于人类的解放和文明进步这个标准来衡量，就很难得出农民运动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个普遍意义的结论。试看历史上各种聚众造反的农民领袖哪一个提出过能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先进思想，或有别于建立君主专制王朝的政治理想呢？中国历代农民运动由于没有先进的思想指导，所以都归于失败，这已是共识。既然没有先进的思想指导，如何能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如果成功了又当如何？《水浒传》作为文学作品确是不朽名著，但是试设想，这批梁山好汉如果真的坐了天下，会有比宋王朝更利民的治国方针吗？当然文学作品不能当历史教科书来读，过去赋予它这样的角色是不正常的。诚然，反抗总是由压迫而来，是“官逼民反”，百姓总是愿意安居乐业，忍无可忍才会揭竿而起，因此“造反”可能有一定的“理”，并且值得同情，但造反不等于一定具有进步性，不能以唯成分论对待之。相反，这种造反的手段往往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破坏性，规模越大造成的对生产力的破坏越严重。农民运动固然有迫使地主阶级实行让步政策的作用，例如轻徭役、减赋税，但是并不能改变生产关系，无法打破压迫——反抗——改朝换代——新的压迫——新的反抗的循环模式，而正是这种模式使几千年中国的生产力发展缓慢，政治上更跳不出君主专制的体制。马克思说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马克思：《中国纪事》）这段话过去一向为我国马克思主义者所回避。不过话又说回来，太平天国确有与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运动不同